

现代政治的困境及其出路

——对当代社群主义政治的一种考察

吴玉军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0875)

摘要:现代政治将个体权利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将个体自由的实现视为政治的终极目的,而国家或社会仅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本身不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善。现代政治在忠实捍卫个体权利的同时,却造就了德性和欲望、权利和责任失衡的严重后果。当代社群主义对社群共同价值的关注、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强调、对居间性团体的重视,为诊断现代政治的弊端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解决自我权利的极度泛滥造就的现代性后果。

关键词:现代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群主义

中图分类号:B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1-0083-07

现代性意味着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变。现代性不再将社会看作是首要的东西,而是将社会看作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结合在一起的联合体。个人不再仅仅是社会的产品,拥有有限的自主性,相反,却获得了无限的独立自由。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生,正是现代性的突出标志。自由主义的个体性原则,将自我视为独立的、完整的存在。在价值序列中,自由主义将群体本位的价值让位于个体本位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以自由主义观念为基础的当代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原子化个人主义与归属感的匮乏,私人领域的无限扩展与公共意识的缺失等社会问题。如何建构一种共享化的人际关系,如何引导人们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等就成为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运动的重要关注点。社群主义以及社群运动的出现,就旨

在摆脱现代政治面临的这一困境。

一、社群理念与社群运动

社群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世界出现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潮。它主要是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盛行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批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与之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社群主义一经产生便对政治现实发生了影响。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新出现了所谓“社群运动”(Communitarian movement)。社群运动是社群成员自愿发起的互助互爱运动,它提倡为“社群服务”、“为他人做好事”、“使所有人感到社群的温暖”。社群主义是对西方思想中自古就有的社群观念的继承和发展。社群是指拥有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或共同信仰、价值目标、规范体系、关系稳定而持久的社会群体。家庭、村落、城镇、民族、宗教团体等都属于社

群形式。社群的本质决定其成员的属性和特征;由其共同的利益和社会共识决定着,社群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整体之间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社群尽管是由一群人组成,但是社群并不能和一群人相等同。例如,一群在跳蚤市场上的人员,尽管他们由于特定的情境构成一个群体,但他们之间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为一个社群。对此,当代社群主义思想家爱兹安尼认为,社群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它包含了共同理解的意义;而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①“社群主义”正是对社群生活方式、社群行为、社群精神的概括和总结。

社群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主义,提倡公益政治学。社群主义是在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阐述自己的思想的。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自我观、社会观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在社群主义看来,自由主义的自我是无负担性的自我,先于任何目的和善,是一种原子化的自我;自由主义的社群是达成个人合作的场所,只是实现个体自我价值的必要工具,不具有内在的善。与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对立,在社群主义看来,自我应该植根于特定历史脉络中,社群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看作是自己的目标,因此,从根本上而言社群是一种构成性的存在。社群“不仅可以规定公民同胞可以拥有什么,而且规定了他们是谁;不只提供了他们像在自由结社可以选择建立的关系,也提供了可以让他们慢慢去发现的相互关系;不只成为个体的一个特征,也成了他们认同的构成部分。”^②总之,社群主义力图通过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批判,对社群观念的阐发,对德性的提倡,对公益的追求来建构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理论派别。

同时,社群主义提倡公共精神的建构,关注德行的提升。社群主义者认为,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建构一种新的观念的、社会的和哲学的图景。他们力图与极端的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极端的自由主义认为,如果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那么他们将生活得十分美好。但在社群主义者看

来,自由的个体需要一个社群来保护他们免受政府的威胁,个体需要借助亲属、朋友、邻居以及其他社群成员友善的激励保持自己的德性。作为一种引导性的行为,这种道德激励要远胜于政府的控制,也远胜于对权威的恐惧。

在上述观念的引导下,社群主义从一种思潮扩展为日益壮大的一场运动。1990年,在爱兹安尼的努力下,社群主义创办了《负责任的社群》(The Responsive Community)期刊,发表了一系列分析公共政策的文章。1990年,15名伦理学家、社会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聚集在华盛顿,联名发表了代表社群主义主张的纲领性文件:《负责任的社群主义纲领:权利与责任》,在其中表达了他们的基本立场。因而,社群主义者并不局限在学术范围之内,而是努力将社群主义发展成为一场社会运动。

二、现代性的隐忧

社群主义之所以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政治运动,有着其深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其中,现代性的极端化发展所造就的内在矛盾,是这一思想流派产生的特定境遇。

按照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内在交织着两股力量,即经济冲击力和宗教冲击力。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击力养成了资本家挺进新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而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击力则造就了资本家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两股看似相反的推动力在矛盾交织中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早期的资本主义阶段,资产者为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稳定,致力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曾在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方面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与丹尼尔·贝尔的观点相类似,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现代性在发轫之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推动、相互支持的亲和力。新教的禁欲伦理精神,促使新教徒在世俗生活世界采取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通过自己在现实中的辛勤劳作来回应上帝的感召力。这种理性化

的生活态度,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现代社会赖以成立的社会经济组织、科学技术、科层制度、法律系统等等,都植根于这种理性化的精神气质。

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政治的关注程度,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当中,对19世纪美国社会发达的公民结社现象赞叹不已。在他看来,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无需政府的介入,是美国制度最为突出的优点之一。在那里,人民普遍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踊跃组织社团、举办活动,力图做好种种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对此,他描绘到:

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想传播某一真理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③

在托克维尔看来,公民对社团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使得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得到了有效的补充,从而使整个社会不至于出现原子化的个人组成一个机械联合体的现象。这种发达的公共参与保证了自由民主的有效实现。对此,托克维尔指出,

在民主制度下,蔚为大观的壮举并不由公家完成,而是由私人自力完成的。民主并不给予人民以最精明能干的政府,但能提供最精明能干的政府往往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使整个社会洋溢持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

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和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的精力。这就是民主的真正好处。^④

可以说,处于现代性早期的美国社会,能够较好地个体的权利与社会责任,物质享受与精神境界的提升结合起来。这一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上,美国都呈现出蓬勃向上,协调发展的情景。

如果说在现代性早期,权利与责任、欲望与德性之间保持了较好的平衡的话,那么这种现象随着现代性的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历史。在后工业化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相互交织,在矛盾中前行的局面被打破,代之以的是经济冲动力压倒了宗教冲动力。

现代性的进展在突出“经济冲动力”一面的同时,将“宗教冲动力”忽视了,社会发展中的两个具有相互制约性的因素失去了内在的平衡。在当代社会,所有一切都被纳入到了理性算计过程当中,工具理性日益远离了价值理性,手段压制了目的,财富的追求剥夺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只剩下与赤裸裸的世俗情欲的关联。当工具理性丧失价值理性的规约时,欲求超出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成为了无限的要求。在工具理性的推动下,个体丧失了一切禁忌,外在的一切成为人们竞相批判和否定的对象。曾经被认为神秘的自然和传统本身,在伸张自我个性的现代人看来,不过是任意宰制和批判的东西。工具主义之下的世俗化运动其最终结果是,“文化——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化——承接了同魔鬼打交道的任务。可它不像宗教那样去驯服魔鬼,而是以世俗化(艺术与文学)的姿态去拥抱、发觉、钻研它,逐渐视其为创作的源泉……行动一旦合法,历史的钟摆不免朝这松弛的一端移动,日益远离节制和约束。”^⑤

这样,在资本主义的后工业阶段,人们摆脱了外在自然赋予人们的神秘性,却背上了金钱崇拜的重负,放逐上帝之后的现代人又成为了受商品和货币所支配的空心人。在这个追求高度自由、个性的时代使得新教伦理所倡导的观念彻底受到解构。“一切不再照旧”、“人们有权在此时此地享受幸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伴随着感性欲望膨胀的是人们对外在公共事务日益失去兴趣,早期的发达结社逐渐被“耽于冥想、埋头私事、不问政治”所取代。“人们宁愿留在家在家里享受私人生活的满足,只要当时的政府生产这些满足的手段和广泛地分配这些手段。”^⑥但是,将个体束缚在私人领域内,对公共事务不予以关心时,专制主义方便之门实际已被打开。托克维尔称这种专制主义为“温和的”专制主义。它不是旧时代那种恐怖和压制性的暴政,政府是温和的家长式的,它甚至可以保持民主的形式,有定期的选举。但事实上,这一切都需要依靠一个巨大的监护权力来驱动,而人们却是无法控制这个巨大的权力的。托克维尔认为,对于这种温和的专制主义的最好防御也是唯一的防御方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当中,人们既看重参与各级政府,也看重各种自发的结社。但是,正如查尔斯·泰勒(C. Taylor)所担忧的那样,“自我关注的个人利益至上主义对这种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旦参与行为衰减了,一旦曾作为媒介的横向联合团体萎缩了,个体公民就会独自面对巨大的官僚国家,正确的讲,就会感到无能为力。”^⑦这就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发展至极端所导致的吊诡现象。个体自由权利和积极民主参与之间的天平如果片面地倾向于其中任何一方,其中的危险后果将会是显而易见的。

三、现代政治的扬弃

面对发达现代性出现的问题,社群主义在哲学、政治学、教育等各个层面上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社群主义力图通过自身的理论努力,摆脱现代性造就的上述诸多问题。

首先,社群不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它具有内在的价值和善。按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自我不是由个体所选择的善构成,相反,个体具有选择善的能力;自我主要不是由与他人的关系,与自然、历史、抑或是神圣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相反,自我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不应受到外在的限制。与之相对应,自由主义假定,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每个人都有不可化约的价值和理想。要使这些具有不同理想和价值

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合作的社会体系之中,就必须制定一些大家共同遵循的公共规范。而这些公共规范的达成,则是不同道德、哲学和宗教观念的人们经过自由选择的结果。自由主义的这些假定意味着它不把社会或共同体看作首要的东西,而是把社会理解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地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因而在自由主义观念当中,国家和社会仅仅是个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它的存在只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外在的程序化框架,本身没有内在的价值和善。与自由主义的社群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社群主义认为,社群并不是个人追逐私利、达成个人合作的场所,社群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整体之间应该具有休戚与共的关系。社群不仅仅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相反,它具有内在的价值或包含内在的善,“不仅可以规定公民同胞可以拥有什么,而且规定了他们是谁;不只提供了他们像在自由结社可以选择建立的关系,也提供了可以让他们慢慢去发现的相互关系;不只成为个体的一个特征,也成了他们认同的构成部分。”^⑧在这种社群中,结社可以进化为共同体,互利合作可以进一步滋长为分享和参与,而集体属性可以演变成共同的归属。

其次,社群主义注重个体价值的神圣性,但认为个体并不存在于一个抽象的真空当中。社群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扬弃而非单纯的否定,当代社群主义也并非权威主义,并不否认个体的价值。“社群主义者基本上都支持自由民主的社会,广义上也可称为自由主义者。”^⑨社群主义并不否认个体的自由权利,但是他们强调指出,这些自由权利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先天的,他们认为,人们生来并没有道德的和社会的价值。如果人们要成为文明人,他们必须获得价值观念。社群主义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讲,家庭确立了道德教育的基础;学校是维护道德的第二道防线。社群联系,无论是宗教机构,学校,还是社区聚会都会强化那些以前一直获得的价值。这些社会机构是德性的温床,在这里,道德被种植和培育下来。也正因如此,社群主义主张个体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而不是将个体的权利置于不可限定的至高地

位。在社群主义看来,文明的举止需要对权利所作的保护不至演化为极端主义做法。不应对权利进行随心所欲的改造,不应将每一种权利都看作是绝对的东西。法庭应该在个体权利与社会责任之间保持一个持久的平衡。法院赋予那些直接掌握其他人命运的人员以严格的审查权、机场的检查权和毒品的检查权。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小心呵护权利和责任,不能让其中的任何一方压制住另一方。

再次,社群主义对中间性团体寄予很高的期望,力图重振社群的权威。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集中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人口的大范围流动,一些次级的社会群体逐渐消失,其影响力逐渐下降。正如伯杰所言,“现代化的力量就像一把巨大的铁锤,无所顾及地砸向所有旧的社区机构——氏族、村庄、部落、地区……”^⑩但是,在社群主义看来,一些社群无论如何是不能消失,其重要性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忽视的。社群主义认为,自由的个体需要一个社群来保护他们免受政府的威胁,个体需要借助亲属、朋友、邻居以及其他社群成员友善的激励保持自己的德性。缺少了这些社群,人们之间难以沟通、相识,难以共同思考他们的共同价值,难以为了共同的美好的生活而奋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社群主义试图借助国家和个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性团体,来克服现代社会所造就的局限性。对于家庭、邻里、教堂,这些社群,需要现代人精心呵护,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对此,社群主义者指出:

当我们的公园、广场以及其他公共领域被暴徒所威胁,社群也就受到阻碍了。社区治安岗哨、邻人之间对犯罪的防御、毒品检查都是有助于重新获得社群的最新手段。如果家庭和学校在传递价值观方面做的十分出色的话,社区的公共安全所承受的压力将会少得多。¹¹

在此,我们需要看到,社群主义者力图在个人主义观念十分盛行的社会当中寻求重建社群。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回返到一个小村社或小城镇是适合当代社会现实的。勿宁说,他们所需要的是加强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使人们克服孤立状态

和异化状态。他们认为,社群当中必须要重建道德的声音,这一道德的声音可以鼓励人们更加富有德性的行动。社群需要培养文明的举止,需要培育一种社会秩序意识和相互体谅的情怀。若非如此,现代社会只能借助巡警、审计员和警察了。

最后,社群主义强调公民参与政治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在西方历史传统中,存在两种公民观,一种是共和主义公民观,一种是自由主义公民观。前者也是社群论的思想渊源。自由主义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开来,认为私人领域属于个人自由的范围,每个人在其中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认为良好的生活方式,各种冲突、对立的主张都可以在私人领域内得到发展,只要不违反公共领域的规则,政府不能以任何理由干涉私人活动。而且,参与公共生活也不是个人必须的事情,政府没有权力强迫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相反,按照共和主义的公民观,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公民的应有之义,这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表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社群以促进所有公民美德的实践为目的。城邦的重要之处在于提供一个公共领域,刺激其公民经由政治参与种种美德,以促进共同美好的生活。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参与政治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它是成就一个人的基本条件。

当代社群主义者遵从亚里士多德共和主义的传统,倡导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按照 Oldfield 的观点,政治参与对于参与者本人具有内在价值,这种参与是“多数人所渴望的人类共存的最高形式”。¹²按照这种观点,政治生活优越于纯粹私人性的天伦之乐,邻居友谊和对职业的追求,因此应该占据生活的中心位置。不能从事政治会使得人们成为极不完整和发育不全的存在者。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隐忧》中的论述与 Oldfield 的观点也相近。泰勒指出,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最终成为那种“封闭在自己的心中”的个人,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参与自我管理。他们宁愿在家里享受私人生活的满足,只要当时的政府生产这些满足的手段。¹³

在社群主义看来,积极的政治参与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自由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个人的广泛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同时通过这种积极的参与,展开公共辩论,可以防止独裁主义的专断现象。对此,泰勒就明确提出:

自我关注的个人利益至上主义对这种文化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旦政治参与衰减了,一旦曾作为媒介的横向联合团体萎缩了,个体公民就会面临巨大的官僚国家,正确地讲,就会感到无能为力。这使得公民变得更加消极,并形成了温和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¹⁴

更多的社群主义者重视居间性的社会团体的重要性,力图倡导人们积极参与到这些团体的公共生活之中。他们认为,个体是在各种公民社会的自愿组织,如教会、家庭、联合会、种族团体、合作组织、环境群体、邻里、慈善机构等当中习得共同义务感的。正如沃尔泽所指出的,“使民主政治成为可能的品质只有在公民社会的团体网络中才能习得。”¹⁵

四、结语

社群主义力图通过对现代政治,特别是个人主义政治的反思,建构一种全新的政治理论,以实现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和改造。社群主义对社群共同价值的关注、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强调、对居间性团体的重视等等,都为诊断现代性的弊端提供了良方。对于解决正在积极追求现代性的中国而言,社群主义的这些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现代性洪流横扫社会各个领域的情境下,社群主义所提出的旨在解决现代政治问题的药方也遇到很大的挑战。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基于当代社会多元化的基本现实,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在不触及法律制度的前提下都是合法的,都不应当受到限制。对于现代社会的这一突出现象,罗尔斯指出,“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不是一种可以很快消失的纯历史状

态,它是民主社会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特征。”¹⁶基于这种考虑,罗尔斯力图“用一种在政治上能够合理地指称公民为公民的观念,置换公共理性当中有关真理或公义(truth or right)的全整论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¹⁷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那种试图用一种全整性真理(the whole truth)来赢得整个世界的严酷斗争,已经难以奏效。一个社群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建构共享的善,借助什么样的途径来提升人们的德性水平,这是社群主义面对的重大挑战。对此,有评论家就指出:

如何在今天当代西方社会碎裂化的道德共同体中获得一种不是在概念上而是在实践上众口称是的道德目标?即使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又应如何对待社群中必然存在或迟早会出现的少数不认可这些目标的人和试图变革创新的人?如果这种高度认同的道德追求出现了重大的偏差怎么办?在现代社会中,而不是在那些偏僻的小型社区中,又有谁来保证这种道德得到切实执行?如何防止这个社会的成员或临时的来访者——例如一个外来投资者——违反这种公认的道德?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社群主义的理想所能实现的。¹⁸

尽管社群主义的理想在现实社会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不能说社群主义的观念就是一种向后看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实际上,社群主义者并不是希望要恢复亚里士多德式的城邦共同体,他们只是让人们注意到在人类生活中,一些特定的结社或社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群主义者期望个人在现代的各种组织中,仍然能维系住某种程度的共同体关系,他们并不幻想回到以家庭、亲族、邻里和社区生活为重心的时代……社群主义者的关心所在,可说是努力(重建)现代人能接受的(共同体关系),不管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¹⁹社群主义是在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只能被看作是对自由主义困境的一种纠正。也只有在这一限度内才能彰显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脱离这一情境,就会走向反面。

注:

- ① Amitai Etzioni, *The Essential Communitarian Read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 xiii.
- ② ③ 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49–151, p. 150.
- ④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635—636 页。
- ⑤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64 页。
- ⑥ ⑦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209 页。
- ⑧ ⑨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12 页。
- ⑩ 关启文:《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社会理论学报》2002 年第 2 期。
- ⑪ 伯杰:《面向现代性》,转引自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 页。
- ⑫ “We, the Communitarians”, in *Rights and Common Good: the*

-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5, p. 2.
- ⑬ ⑭ Adrian Oldfield, *Citizenship and Community: Civic Republicanism and the Modern World*, Routledge, 1990, p. 6, p. 6. 转引自 Will Kymlicka, Wayne Norman: “公民的回归——公民理论近作综述”,《共和、社群与公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0、250 页。
- ⑮ ⑯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 页。
- ⑰ ⑱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 页。
- ⑲ ⑳ 约翰·罗尔斯:《公共理性再探》,《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 页。
- ㉑ 苏力:《社群主义构成一种挑战吗?》,《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1 页。
- ㉒ 顾忠华:《民主社会中的个人与社群》,《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02 页。

〔责任编辑:宁 岩〕

The Predicament of the Modern Politics and It's Outlet: An approach to modern communitarianism

Wu Yijun

Abstract: Modern politics regards the individual rights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m as the end of it. According to this idea, state or society is only a tool to realizing individual rights, without any inherent values or goods. Although modern politics protects human rights, it leads to an unbalance between the virtue and desire,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Modern communitarianism,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ommon value of the community, emphasiz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groups, provides a new viewpoint for us to diagnose the abuse of modern politics and helps us solve the modern consequence led by the flooding of individual rights.

Key words: modernity; liberalism; individualism; communitarianism